

后浪出版公司

[瑞典] 喜仁龙——著 邓可——译 李孝聪作序

Oswald Sirén

北京的城墙

THE WALLS AND GATES OF PEKING

与城门



四川人民出版社

 后浪出版公司

北京的城墙

THE WALLS AND GATES OF PEKING

与城门

[瑞典]喜仁龙——著 邓可——译 李孝聪作序

Osvald Sirén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京的城墙与城门 / (瑞典) 喜仁龙著 ; 邓可译

. — 成都 :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220-10129-8

I . ①北… II . ①喜… ②邓… III . ①城墙—北京

IV . ①K928.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98089 号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7 POST WAVE PUBLISHING CONSULTING (Beijing) Co., Ltd.

本书中文简体版权归属于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的城墙与城门

著 者
译 者
选题策划
出版统筹
特约编辑
责任编辑
装帧制造
营销推广

[瑞典] 喜仁龙

邓 可

后浪出版公司

吴兴元

林立扬

唐 婧

墨白空间·陈威仲

ONEBOOK

出版发行
网 址
E - m a i l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槐树街 2 号)

<http://www.scpph.com>

scrmcbs@sina.com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143 毫米 × 210 毫米

11

286 千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

978-7-220-1012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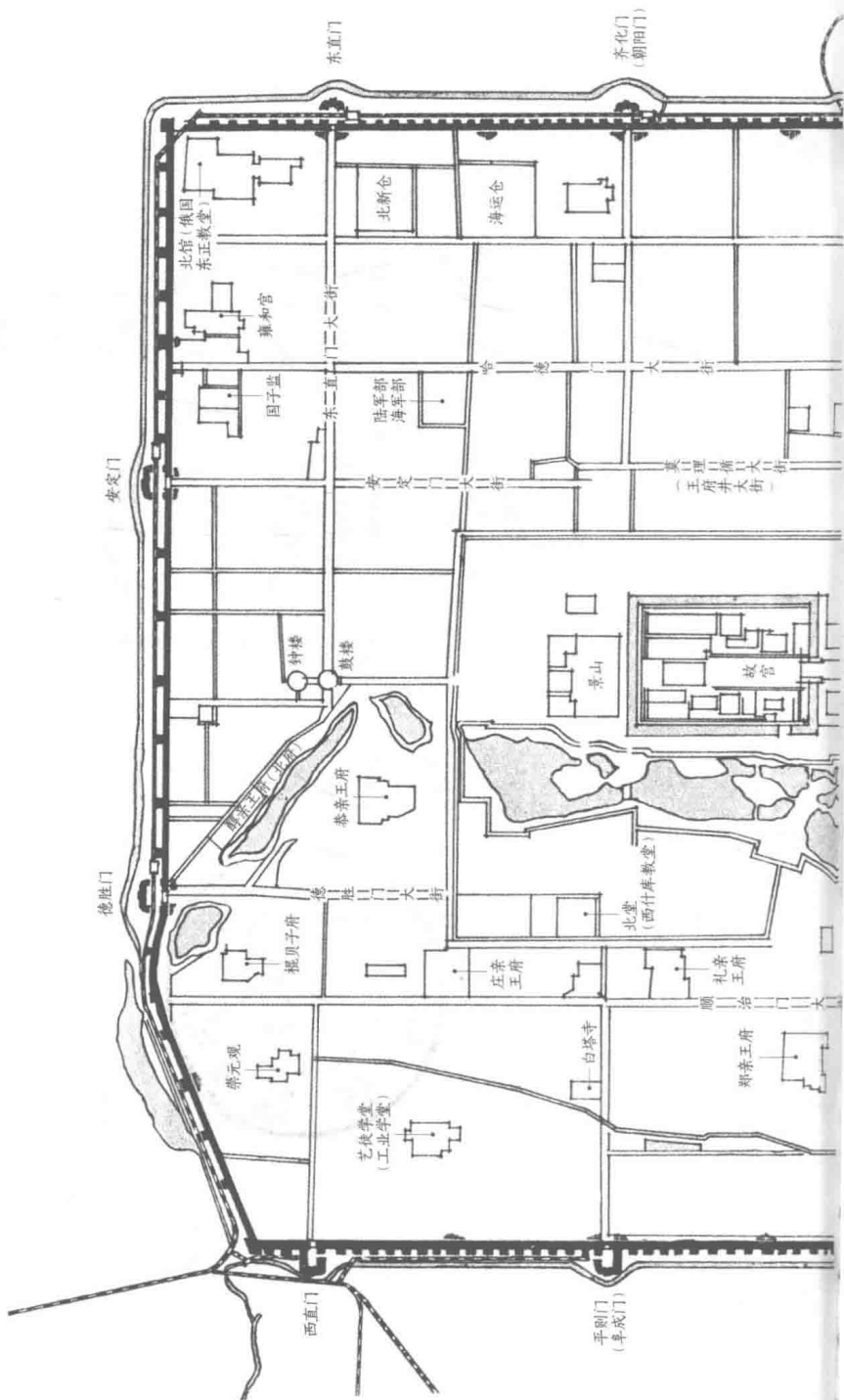
39.8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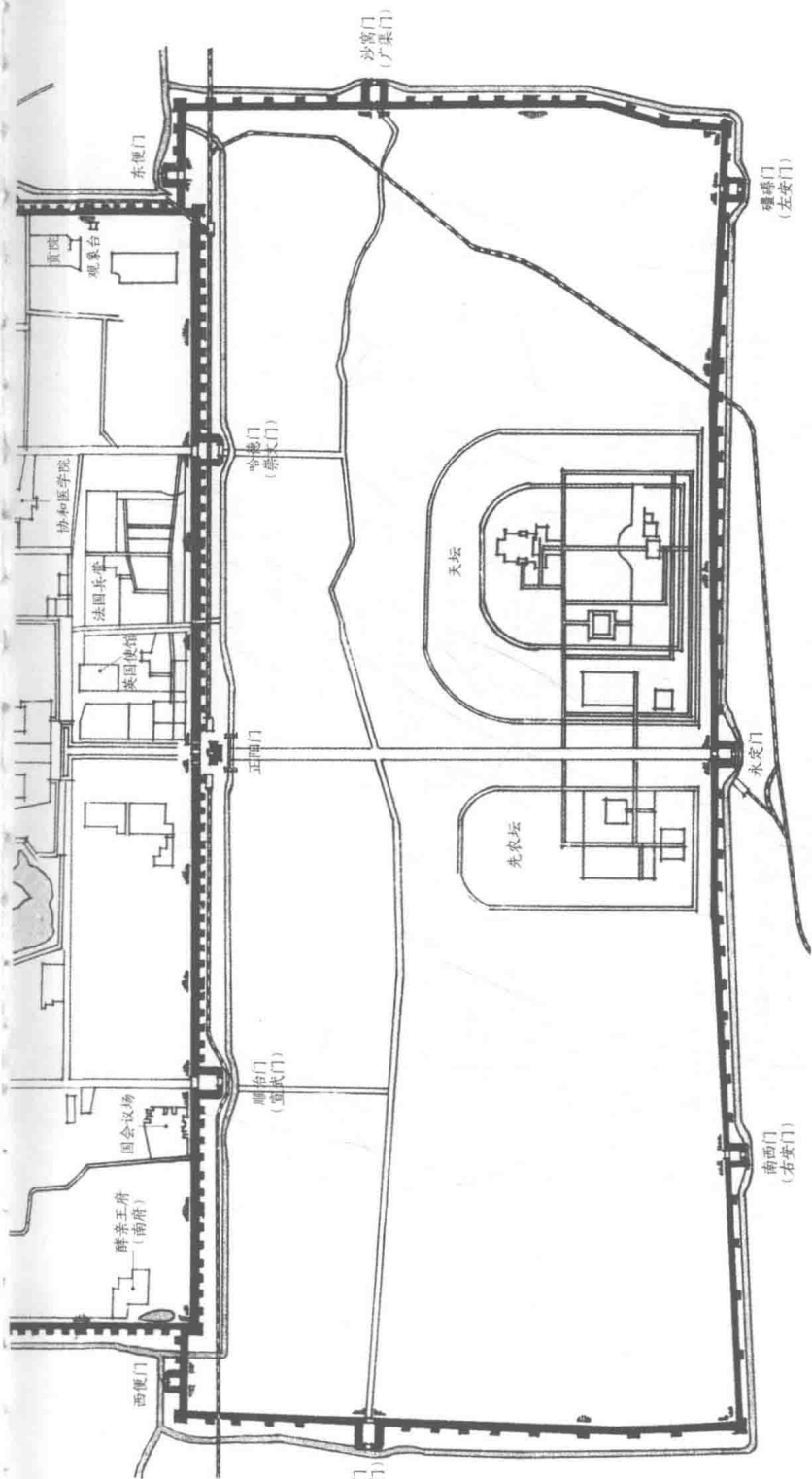
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周天晖 copyright@hinabook.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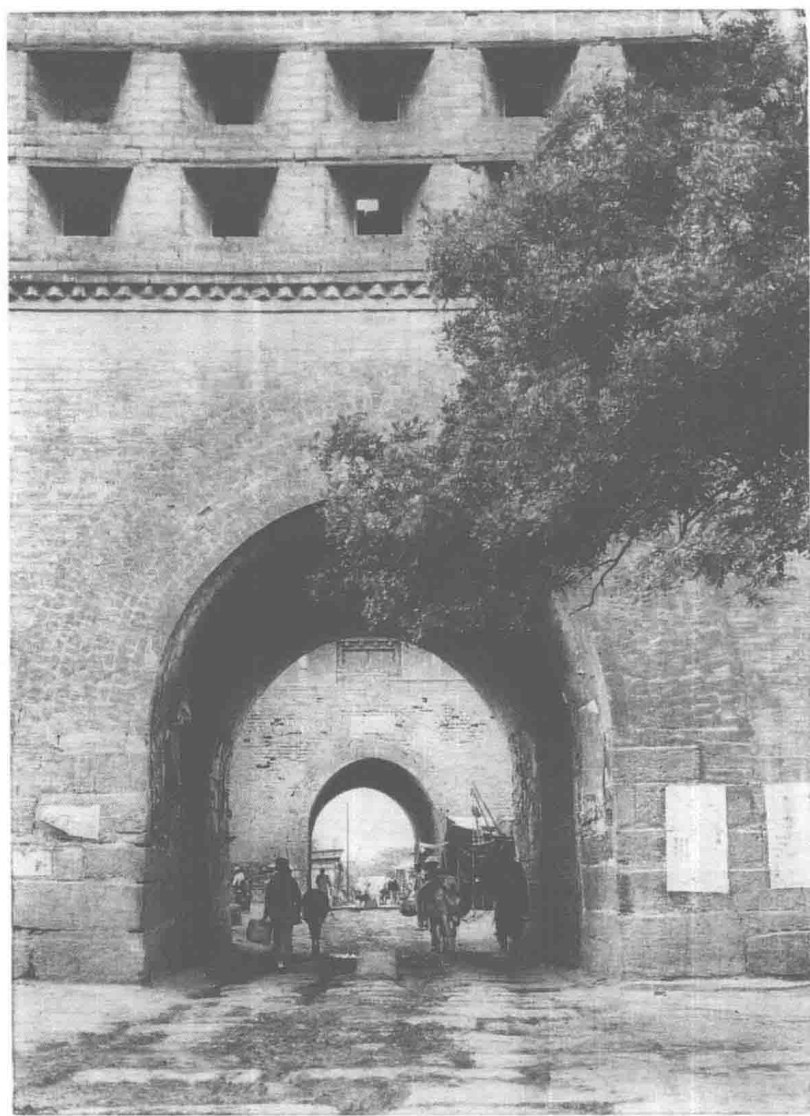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010-64010019







Sha Wu Men

View through the outer gate

沙窝门箭楼门洞透视

出版前言

本书根据瑞典艺术史学者喜仁龙（Osvald Sirén）的作品 *The Walls and Gates of Peking* 译就。20 世纪 20 年代初作者曾在北京生活居住，实地考察了北京当时遗存的城墙与城门，并于 1924 年在伦敦出版该书，内容包括细致的勘测观察手记、53 幅城门建筑手绘图纸、128 张实地拍摄的老城墙及城门的照片。不过那时在西方，有关中国城墙城门的话题并不受人关注，因此这本书在首印 800 册后便销声匿迹了。直到北平解放前夕，在英留学的侯仁之偶然间发现了这本记录着北京城墙与城门各类详细数据及大量精细图片的奇书，以重价购得并带回国内，向国人介绍了这部科学研究北京城墙城门的重要著作。

北京的建城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的蓟城，而成为都城则始于辽南京，此后的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城都矗立在这片土地上。明代的北京城始建于永乐年间，由外至内分别为外城、内城、皇城和宫城；在四重城墙上，各自建有城门。外城七门（广渠门、广安门、左安门、右安门、东便门、西便门、永定门），内城九门（东直门、西直门、朝阳门、阜成门、崇文门、宣武门、德胜门、安定门、前门），皇城四门（大明门、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宫城四门（午门、神武门、东华门、西华门）。明代建成的北京城经

历了明朝、清朝、民国，还保留着较完整的城墙和古城的格局，本书中作者考察的，主要是民国时尚存的北京内外城的城墙与城门。

喜仁龙作为欧亚大陆另一端的瑞典学者，被这座东方城市独特的美所震撼，直陈“这本书的源起是北京的城门之美，是中国都城所展现出的举世无双的壮美特征，是秀美环境中的古建筑、新生的树木和衰败的护城河，是建筑的装饰风格”。面对这些逐渐走向衰亡的宏伟古迹，除了在描写中投入艺术史家的浪漫与情怀，喜仁龙还坚持严谨的研究方法：挖掘中国历史文献中对城墙城门的繁杂记载，勘测丈量每一段城墙、每一座城楼的尺寸，观察记录城墙、城门及周边街市乡野的现状，实景拍摄城墙城门的照片，精细绘制城门各种角度的建筑细节图，使这本考察手记在文学性和科学性两方面达到了平衡。

1985年本书曾出版过简体中文版，无奈文字和图片均有删减。此次重新出版，我们完全采用英文首版中的图片，细节处理也对照原图，尽力呈现原书的风貌。译稿方面也是完整重译，并修订了原著中的一些错误，例如：作者将完颜宗望和金太宗完颜乌乞买误作同一人；由于对引用的文献理解有误，作者对明代城墙包砖工程进行的时间推断也有偏差；还有对城门与古代奇门遁甲的关系，作者似乎也不甚明了。这些内容，我们均在不影响正文流畅性的前提下，在页下做了注释说明（除标明的译者注之外，其余均为编者注）。关于作者 Osvald Sirén 的中译名，有学者研究指出，考证民国时期学者往来书信与内政部政令，另有译法“喜龙仁”，不过本次仍选择沿用之前“喜仁龙”的译法。需要提出的是书中所有的建筑绘图，若原图中有中文手写图名，均予以保留，但图注中根据现代习惯重新命名，如内楼（inner tower）统一为城楼，外楼（outer tower）统

一为箭楼。

从帝制的束缚下挣脱出来的中国，连带着将帝国象征的城墙与城门一起打倒。庆幸作者在百年前，用自己的笔和相机，记录了一座抛却浮华、真实而沧桑的北京城。

此番后浪出版公司共推出三个版本的《北京的城墙与城门》：精装版与平装普通版除装帧方式不同外，内文的用纸与印刷工艺完全相同；为了满足更多读者的需求，同时提升便携度，再次推出平装普及版，相对于前两个版本，开本变小了，改用单色印刷，价格也更亲民。希望我们的努力能将这本好书带给更多渴望了解老北京城及传统建筑文化的读者。

后浪出版公司

2017年4月

中文版新序

地球上的人类大都经历过“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的历史阶段，这就使得世界上19世纪以前形成的城市普遍营造了城墙，城墙成为城市最突出的标志之一。城墙、城门楼和城墙上的雉堞，形成了一道显著而美丽的城市天际线，人们从遥远的田野上很容易辨认城市，而当你走近它时，又会被高耸威严的城墙所震撼。这就难怪当侯仁之先生在1932年初秋的傍晚，乘火车穿过华北平原到达北平（即北京）前门车站时，巍峨的正阳门城楼和浑厚的城墙蓦然出现在他眼前，使其从视觉到心间产生了一种震撼，由此萌发了对北京城的兴趣，竟然研究它长达80年之久。1924年瑞典学者喜仁龙（Osvald Sirén）出版了关于北京城的研究著作《北京的城墙与城门》一书，1947年侯仁之先生在英国伦敦旧书店慧眼识珠，买下这本书，并将它介绍给中国的读者。

喜仁龙教授（Osvald Sirén，1879—1966），出生在芬兰赫尔辛基，是一位艺术史学家。他最初的学术旨趣是研究18世纪的欧洲艺术史，1908—1923年，喜仁龙取得了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讲授欧洲近代美术史与艺术理论的教席。从1928年起，他负责瑞典国家博物馆绘画与雕刻部的管理，在那里他发现了许多馆藏的中国绘画作品，使他后来对意大利文艺复兴和中国艺术产生了更大的

兴趣，他在博物馆一直工作到1945年。喜仁龙曾经数次（1918、1921—1923、1929—1930、1934—1935、1954、1956）来中国考察，城市建筑、绘画艺术、佛教罗汉造像最让其流连忘返。值得庆幸的是，他在中国考察城墙和城门的时候，是中国城市的城墙和城门还没有遭受全面拆毁破坏的时期。

从14世纪末至16世纪初，欧洲城市商业资本的活跃创造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欧洲的城市普遍经历了“文艺复兴”后的重建，构筑带有棱堡防御体系的城墙成为城市的新标志。近代产业革命以后，工业机器生产普及，现代交通工具在城市推广，越来越多的人口涌入城市，欧洲城市在城墙的外围普遍兴起新的建成区，林立的楼群压抑着昔日的城堡，城墙不再是欧洲城市的天际线，不能给初到之人以强烈的震撼，反而会引起失落之感。当喜仁龙先生初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时，中国的城市还没有经历近代化的熏陶，大多数城市的城墙还相当完整，他作为具有艺术史专业素养的学者，从对城市失落的欧洲来到中国，获得了真切的震撼，尤其是北京城的城墙“是最动人心魄的古迹，幅员辽阔，沉稳雄壮，有一种睥睨四邻的气魄和韵律”。正如其在《英文版自序》中所说的：“对城门艺术特征的兴趣，逐渐唤醒了我去了解这些历史遗迹重要性的想法，从而进一步探求它们的修筑以及在不同时期改建的历史。”正是这样学术专业的思考和眼光，促使他对中国城市开始了真正的考察。

20世纪前半叶的完整北京城，虽然是明清两代留下的城墙和城门，但是北京内城（或称“满城”“北城”）的东西城墙和街巷胡同，却基本上以元大都为基础。元大都是马背上的民族完全按照中原汉式营建都城的礼制，在田野上规划营建的城市，其街道胡同布局是从游牧转为定居时平均分配宅基地管理制度的产物，为后来

的北京城留下了整齐划一的空间结构，这是一笔全世界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遗产。大都城墙是实现都城稳定与有序管理的工具之一，失去了城墙的约束，也就破坏了空间结构，更难以体现文化遗产的特征。所以，北京城本来可以以整体城市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可是随着北京城城墙的拆除，这一希望无可挽回地落空了，北京只能以紫禁城等单体建筑群来“申遗”了。

人类对历史文化遗物的保护和收藏，是对逝去时代的纪念和追寻，是对逝去时代文化代表物的珍惜和欣赏。历史上，人们总是将前一时代的宫殿建筑群视为过去统治的象征和代表，在改朝换代时，把前朝的建筑或城市加以毁灭性破坏，被誉为“革故鼎新”。例如：项羽烧毁秦咸阳城“大火三月不灭”，金兵攻入北宋都城汴梁，毁大内、宫殿，拆下的梁、柱和“艮岳”山石全部运到了燕京，以营筑金中都城。元灭金，金中也都遭到彻底的破坏；明灭元，同样平毁了元大都的宫殿。在中国都城建设史中，仅有唐朝、清朝两代沿用了前朝的城市宫室。在欧洲，则有罗马帝国摧毁古希腊的城市和宫殿，中世纪十字军东征，沿途破坏烧掠，所到之处尽为瓦砾废墟。

不同时代的城市设计表达了不同的社会制度与文化，当人类社会走向全球化和城市现代化时，人类在满足物质需求的同时，开始自觉地、有意识地尽可能多地保存一些能够代表各个地区、各民族文化的传统建筑，以使年轻一代永远不会遗忘自己的“根”与民族文化的底蕴。作为民族文化特征标志的传统建筑，不能脱离周围环境而存在，不能让子孙后代仅仅从博物馆中去感受，所以在城市建设中一定要注意保存前代历史时期的城市设计规划，保护城市中有历史标志性的城墙、城门和街道格局。

现代化是一柄双刃剑！现代化虽然能够带动城市产业的勃兴，

生活条件的改善，但是也进行着建设性的破坏。随着大批传统旧建筑被拆毁，中国城市的传统格局被打破，城市丧失了历史景观风貌，同时居住居民的心理情结也受到了伤害。曾经有领导讲过“给城市脱胎换骨”，对现代城市缺少人文关怀，导致传统价值观的丧失，意味着不再有更多的人热爱和关心城市。功利心理侵蚀着市民的良知，“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攀比性地营造高层建筑，中国城市变得“千城一面”，原本建筑的丰碑变成了权力的象征。由于对古建筑和历史环境的保护缺乏认识，因此，一批批古建筑及其周围环境在工业化的浪潮中遭到毁灭。

旧城中心地带仍然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房地产业总是看好这片区域，旧城内的居民被迁出，新住宅区人口过度集中，却缺少就业机会，仅仅具有“睡眠”功能，例如：北京的望京、天通苑、回龙观就是集中了几十万人人口，除了住宅而缺少其他城市功能的大型居住区。每天上班族加剧了北京城市交通的繁忙与阻塞，形成一个难以解决的怪圈。

有规划的城市是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有规划的城市代表着有秩序，在王朝时代有秩序的表象就是营筑城墙。从中国城市结构的基本原则来分析，中国人一向注重“墙”的作用。墙，可以用砖石砌筑，可以用土夯筑，也可以是用篱笆木栅圈围。每一所住宅院落、衙署、仓场或者庙观，都可以看作是一个个用墙围起来的“小城”。南北朝至隋唐期间，中国城市盛行封闭的坊市制度，若干不同功能的院落式组群，用墙围起来，合成一个个“坊”；坊内有十字街道，坊墙有门，因此，坊相当于比院落大一些的“城”。若干个坊被街巷隔开，或用高厚的墙围起来，则组成了“城市”。市场也被固定在有限的几个市坊墙内，依时起闭。因

此，那时候的城市街道平直，城市建筑布局显得很规整。宋代以后，虽然“坊墙”渐渐废除，而重视城市功能结构的规划原则仍然不变，修筑城墙更加严谨。现存文献记载，中国人从距今三千年前的周代开始，就习惯于按预先拟订的规划营造城市，除服从于自然环境条件之外，更赋予一定的礼制思想甚至风水观念。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用建筑载体来表现的一个侧面，“反映中国百姓对围墙式建筑物根深蒂固的信赖”。所以，中国历代无论首都，还是中小城市，大多数都是经过规划、用城墙围起来的城市。传统中国城市规划孕育的文化内涵，在于用墙来体现肃穆与崇尚礼制的繁缛，城市内街道的繁华与胡同的幽静形成对比，受城墙约束而形成的严整和含蓄，更表达了城市居民恒久的礼俗状态和文明心态。这是当今我们迈向城市现代化时必须给予关怀的。

“城墙，确实是中国城市中最基本、最令人印象深刻且最耐久的部分。”喜仁龙这样评述我们的城墙，更不要说那些充满中国传统建筑技艺的城门楼了。如今我国历史上数千座城市中保存比较完整城墙的城市已经不多了，根据与现代城市重叠沿用而非城市遗址的初步调查，都城级城墙尚存的城市有：西安、南京、开封，保存城墙相对完整的府级城市有：大同、荆州、宣化、榆林、正定、襄阳、苏州、大理、永年、衢州，城墙完整的州县级城市仅有：寿县、平遥、松潘、兴城、临海。所以，有比较完整城墙的中国城市已经成为稀罕之物，当然需要精心呵护。

距离喜仁龙所著《北京的城墙与城门》第一个中文译本出版又过去了30年，正当人们渐渐失去对往日北京城的印象时，北京后浪出版公司再次翻译出版了这本书。经过细致完整的重译，修正了

前一版中译本的一些错讹，保存了比较清晰的当年拍摄北京城墙和城门的照片，特别是补充了作者原书中有关中国西安、青州城墙和城门的照片。本书中译本的重新出版再次唤醒人们对昔日北京城的印象，它不仅激起思恋的乡情与忆想；而且更引发对保护城市城墙的思考，再次提醒国人只有精心呵护传统建筑，才能因体会其艺术美的价值而产生爱，唯有爱才可能去实现我们的梦。

李孝聪

写于北京大学朗润园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2016年9月17日

中文版序*

远隔重洋，忽得国内来信，欣悉瑞典喜仁龙（Osvald Sirén）教授的旧作《北京的城墙与城门》，已经译为中文，即将付印。译事进行之快对我来说，确实有些意外。欣慰之余，一件往事又忽然闪现在我眼前。

那已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了。我作为一个青年学生，对当时被称作文化古城的北平，心怀向往，终于在一个初秋的傍晚，乘火车到达前门车站（即现在的铁路工人俱乐部^①）。当我在暮色苍茫中随着拥挤的人群走出车站时，巍峨的正阳门城楼和浑厚的城墙蓦然出现在我眼前。从这时起，一粒饱含生机的种子就埋在了我的心田之中。在相继而来的岁月里，尽管风雨飘摇、甚至狂飙陡起摧屋拔木，但是这粒微小的种子，却一直处于萌芽状态。直到北平解放了，这座历史的古城终于焕发了青春，于是埋藏在我心田中并已开始发芽的这粒种子，也就在阳光雨露的滋养中，迅速发育成长起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对北京这座古城的城墙和城门，怀有某种亲切之感，是它启发了我的历史兴趣，把我引进了一座富丽堂皇的科学探讨的殿堂。但是，我对北京这座古城的城墙和城门，却没有什

* 侯仁之先生为1985年中译本所作的序言。

① 现已改为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馆）。

研究。还是在北平解放前夕，我偶然在伦敦一家旧书店里发现了喜仁龙教授的这本书，并以重价把它买下来，通夜加以浏览，我才开始意识到这一组古建筑的艺术价值。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作者对于考察北京城墙与城门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这在我们自己的专家中恐怕也是很少见的。而他自己从实地考察中激发出来的一种真挚的感情，在字里行间也充分地流露出来。他高度评价这组历史纪念物，同时也为它的年久失修而伤心。在考察中，他观测细致，记载不厌其详，这是十分可贵的。当然在记述历代城址的变迁上，由于引证的材料不尽可靠，错误之处也是难免的，但这无损于全书的价值。我个人的看法如此，读者会作出自己的判断，这里也就无需多说了。

记得早在 50 年代初期，当首都的城市建设正在加速进行的时候，城墙存废的问题也就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当时梁思成教授就曾提出过改造旧城墙的一种设想：考虑把宽阔的城墙顶部开辟为登高游憩的地方，同时把墙外的护城河加以修砌，注以清流，两岸进行绿化，这样就无异于在北京旧城的周围，形成一个具有极大特色的环城公园，犹如一条美丽的项链，璀璨有光（其部分设想，有专文发表，并有附图，可惜不在手下，据所记忆，大体如此）。我认为这一设想，是符合“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原则的。其后，我也曾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上，就北京城墙的存废问题，提出了一些个人的看法。我认为，我国有一条“万里长城”，被公认为世界“奇观”之一；我们的首都也有保存得比较完整的城墙与城门，同样是工事宏伟的古建筑，显示了古代劳动人民的创造力。因此，我还以本书为例，借以说明它的历史意义与艺术价值。现在，事隔三十多年，北京的城墙早已拆除。今天幸而保留下来的正阳门内外城楼、